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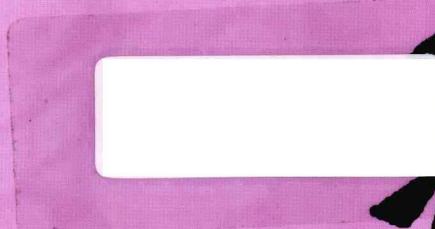
《諸子學刊》編委會編

方 勇 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 主辦

第八輯

諸子學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諸子學刊》編委會編

方勇 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 主辦

諸子學刊

選本題



第八輯

第八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諸子學刊. 第 8 輯 / 方勇主編 ; 《諸子學刊》編委會編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3.4

ISBN 978 - 7 - 5325 - 6791 - 1

I. ①諸… II. ①方… ②諸… III. ①先秦哲學—研究—叢刊 IV. ①B220.5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065351 號

諸子學刊(第八輯)

《諸子學刊》編委會 編

方 勇 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 www.guji.com.cn

(2) E-mail :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啓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28.75 插頁 2 字數 580,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 1—1,300

ISBN 978 - 7 - 5325 - 6791 - 1

B · 811 定價 : 9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目 錄

先秦諸子與戰國時代的楚國學術	湯漳平 (1)
先秦諸子的山水旅遊美學觀	譚家健 (13)
儒家中道的現代思考	徐儒宗 (21)
《論語》“三歸”考辨	耿振東 (37)
先秦儒道生死學三題	刁生虎 (51)
道家的自然與“是”、“應該”二分法	[英] 葛瑞漢 劉思禾 譯 (73)
老聃行狀事迹彙考	邵炳軍 (93)
略論老莊思想體系的基本差異 ——圍繞“人”主體性的確立與消解展開	玄 華 (105)
《莊子》斠議	蔣門馬 (115)
《莊子》中的飛鳥及其哲學理念的呈現	賈學鴻 (131)
《莊》、《荀》禮說淵源考辨	何志華 (141)
莊、屈《漁父》中的儒、道生命情調詮釋與比較	(臺灣)王志楣 (171)
嚴遵、向秀、郭象“獨化”思想之演進	袁 朗 (181)
宋人對郭象《莊子注》的接受與評論	(臺灣)簡光明 (191)
《南華通》為孫嘉淦所著考	李 波 (215)
縱橫家的發展及其在楚國的活動	高華平 (223)
《淮南子》對陰陽家的繼承與創新	陳廣忠 (237)
論《淮南子》與“智伯”其人	汪春泓 (253)
《世說新語》與諸子學	劉康德 (261)
“雜”：劉勰學術思想考論(一) ——《文心》、《劉子》的作者當同為一人	涂光社 (271)
《劉子》袁孝政注本考辨	林其錢 (297)
朱熹《中庸章句》論“尊德性而道問學”	樂愛國 (307)
李贄的兵學思想體系	

- 以《孫子參同》為主要參照 李桂生 郭 偉 (327)
論孫德謙的諸子學研究 陳志平 (343)

“新子學”論壇

- “新子學”構想 方 勇 (361)
“新子學”斷想
 ——從意義和特質談起 刁生虎 王喜英 (369)
“新子學”芻議
 ——以中國文化為本位 張洪興 (373)
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思考 徐國源 (377)
“新子學”的核心在於新 徐志嘯 (379)
“新子學”的學術針對性、時代意義思考 李似珍 (381)
重返中國傳統文化最佳生態現場
 ——對“新子學”的一點理解 李有亮 (385)
站在子學發展的時代制高點上 鍾明奇 (389)
時代召喚“新子學” 孫以昭 (391)
《“新子學”構想》體現時代精神 陸永品 (393)
借力諸子 開拓中國學術新途徑 何美忠 (395)
“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意義 郝 雨 (399)
“新子學”筆談 卿希泰、譚家健、王鍾陵、(澳門)鄧國光等 (403)
“‘新子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崔志博 (409)

講演與書評

傳承百家薪火 衍續子學慧命:《子藏》與莊學研究

- 在“東亞莊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 方山子 (417)
高屋建瓴 獨具匠心
 ——《中國道教思想史》評介 孫瑞雪 (427)
從老子到魏晉玄佛道
 ——評許抗生教授《老子與道家》 王威威 (431)
尋本溯源 摄要擷精
 ——評方勇教授《莊子纂要》 傅璇琮 (439)
搜奇選妙喜空前 “九殘”、“五卷”彙一編
 ——評林其鋐先生《劉子集校合編》 明 志 (443)
- 編後語 《諸子學刊》編委會 (449)

Contents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Chu Scholarship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Tang Zhangping (1)
The Landscape and Travel Aesthetic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Tan Jiajian (13)
Modern Reflections on the Way of <i>Zhong</i> in Confucian Thought	Xu Ruzong (21)
Investigation of the Term “Sangui” in the <i>Analects</i>	Geng Zhendong (37)
Beliefs about Life and Death for the Pre-Qin Confucian and Daoist Thinkers: Three Topics	Diao Shenghu (51)
Taoist Spontaneity and the Dichotomy of “Is” and “Ought”	A. C. Graham Tr. Liu Sihe (73)
An Examination of Sources for the Life of Lao Dan	Shao Bingjun (93)
The Fundamental Contrast Between Lao Zi and Zhuang Zi’s Thought, Regarding Human Subjectivity	Xuan Hua (105)
On the Editing of <i>Zhuangzi</i>	Jiang Menma (115)
Flying Bird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in <i>Zhuangzi</i>	Jia Xuehong (131)
On the Origins of the Discussions of Ritual in <i>Zhuangzi</i> and <i>Xunzi</i>	He Zhihua (141)
Intepretive Comparison of Daoist and Confucian Views of Life, Based on the “Fisherman” Stories of <i>Zhuangzi</i> and Qu Yuan	Wang Zhimei (Taiwan) (17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olitary Transformation”in Yan Zun, Xiang Xiu, and Guo Xiang	Yuan Lang (181)
The Re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Guo Xiang’s <i>Zhuangzi</i> Commentary in the Song Dynasty	Chien Kuang-ming (Taiwan) (191)
On Sun Jiagan’s Authorship of the <i>Nanhua Tong</i>	Li Bo (21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st (Zongheng) School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Chu	Gao Huaping	(223)
The Influence of the Yinyang School on the <i>Huainan Zi</i>	Chen Guangzhong	(237)
On <i>Huainan Zi</i> and Zhi Bo	Wang Chunhong	(253)
<i>Shishuo Xinyu</i> and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Liu Kangde	(261)
“Za”: Studies in Liu Xie’s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Part 1) — The Shared Authorship of <i>Wenxin diaolong</i> and <i>Liuzi</i>	Tu Guangshe	(271)
On the Yuan Xiaozheng’s Edition and Commentary of <i>Liuzi</i>	Lin Qitan	(297)
Zhu Xi’s Discussion of “Honoring His Virtuous Nature and Pursuing Inquiry and Study” in <i>Zhongyong Zhangju</i>	Yue Aiguo	(307)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 Zhi’s Military Scholarship, Based on <i>Sunzi Cantong</i>	Li Guisheng and Guo Wei	(327)
On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of Sun Deqian	Chen Zhiping	(343)

Forum on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The Conception of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Fang Yong	(361)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Nature of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Diao Shenghu and Wang Xiying	(369)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Chinese Culture as Standard	Zhang Hongxing	(373)
A Few Reflections on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Xu Guoyuan	(377)
The Emphasis of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Is on the “New”	Xu Zhixiao	(379)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Current Significance of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Li Sizhen	(381)
Returning to the Finest Exempla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me Understanding of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Li Youliang	(385)
On the Historical Peak of Development for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Zhong Mingqi	(389)
The Time Is Calling For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Sun Yizhao	(391)
The Conception of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Demonstrates the Zeitgeist	Lu Yongpin	(393)
Drawing o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to Carve Out a New Path for		

Chinese Scholarship	He Meizhong	(395)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for Modern Culture	Hao Yu	(399)
Conversation on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Qing Xitai, Tan Jiajian, Wang Zhongling, Deng Guoguang (Macau), etc.	(403)
Summary of Conference on “New Studie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ers”	Cui Zhibo	(409)

Lectures and Book Reviews

The <i>Zizang</i> and <i>Zhuangzi</i> Studies: Keynote Address to the East Asian <i>Zhuangzi</i> Conference	Fang Shanzi	(417)
Evaluation of <i>Zhongguo Daojiao Sixiang Shi</i>	Sun Ruixue	(427)
From <i>Laozi</i> to the Xuanxue, Buddhism, and Daoism of the Wei-Jin Era: On Professor Xu Kangsheng’s <i>Laozi yu Daojia</i>	Wang Weiwei	(431)
On Fang Yong’s <i>Zhuangzi Zuanyao</i>	Fu Xuancong	(439)
On Lin Qitan’s <i>Liuzi Jijiao Hebian</i>	Ming Zhi	(443)
Postscript	Editorial Committee	(449)

先秦諸子與戰國時代的楚國學術

湯漳平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隨着大批楚文物與楚簡帛文獻的先後出土，着實引發了我國學術界長達數十年的楚文化熱。這幾十年間，有關楚族的來源、族屬、社會的發展、學術的狀況、文化的傳承等問題，曾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討論熱潮。然而，時隔兩千多年，今人要研究清楚古代楚人的狀況，難免都會遇到孔子所感歎的文獻“不足徵”（《論語·八佾》）的困境。因而，雖然有不少學者曾從不同的角度，對上述涉及的楚文化中的相關問題發表過許多有價值的看法和觀點，但由於各自所依據的資料以及對相關資料的解讀和認識的差異，各家的看法依然存在許多分歧。為此，筆者以為，總結這些年的研究狀況，理清其思路，對戰國時代的楚國社會及其學術發展的狀況作一次比較全面和系統的梳理，對於我們認識戰國時代以及比較正確地評價這樣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的成就，使之不至於產生不必要的誤讀，應當還是很有必要的。

一

我國號稱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且有着長達數千年不間斷的歷史文獻記載，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經歷過秦火，經歷過兩千多年歲月的大浪沖刷之後，我們目前所能讀到的先秦典籍和文獻資料畢竟相當有限。在這有限的傳世文獻中，究竟哪些是真實可靠的，是當時人親手寫下的作品；哪些是曾經被後人不同程度地修改處理過，需要加以認真鑒別其是非真偽的：這是每位從事先秦學術研究的學者都不能不認真思考的問題。畢竟，差之毫厘，謬之千里。而這些狀況和問題，似乎在有關楚史、楚文化研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筆者從二十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進入先秦文學研究領域，參加過多達數十次有關楚文化與楚文學的學術會議，每次參加會議的學者所提交的論文中，對於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社會和楚國學術狀況的描述，總是出現極大的反差。尤其是討論到產生於戰國時代的楚辭，學者們在論述其楚國社會文化背景時，這種差異就更為明顯。許多學者由於未能準確把握和瞭解處於這一時代的楚國

的社會真實狀況和學術思潮，因而在分析研究楚辭作品時，往往膠柱鼓瑟，導致錯解楚辭作品的情況頻發。因此，筆者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曾先後寫過兩篇文章，批評楚辭研究中的“巫化”和“錯位”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也影響到了國外的一些學者，尤其是日本楚辭學界的一些學者。之所以出現過一場中日學者關於“屈原問題”的論爭，究其原因，也是與此相關的。

不可否認，在傳世數量並不多的先秦文獻中，和中原地區保存下來的文獻相比，楚國的文獻數量更少。真正可以依據的史料，只有《國語·楚語》和《戰國策·楚策》，此外就是《左傳》中涉及楚國與各國關係的相關記載。漢代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曾經為先秦史書保存下來的材料稀少而深感遺憾，因為先秦時期，許多諸侯國原都著有自己的史書，如魯有《春秋》，晉有《乘》，楚有《檮杌》等。可是到司馬遷時，就只能看到《秦紀》，即秦國的史書，而其他諸侯國的史書，可能因為其中有不利於秦的內容，所以秦始皇一聲令下，付之一炬。因而司馬遷說秦“獨留秦紀”，而且記載得又十分簡略。他為此不得不長年周遊天下，收集整理那些流傳於民間的史料，寫成《史記》。我們可以看到，系統寫入《史記·楚世家》中的資料，主要還是來自《國語》、《戰國策》、《左傳》等，其他材料則十分有限。正是基於上述情況，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楚國的實際情況瞭解有限，因而在論述時見仁見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

陳子展先生生前曾對我說，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很運氣，有大量的古代文獻資料出土，這樣我們就可以讀到幾千年來古人未曾讀到的古代書籍，這對於我們古代文學的研究，意義重大。陳先生講話是在二十世紀 80 年代，當時有安徽阜陽雙古堆、山東臨沂銀雀山以及長沙馬王堆等幾座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的多批簡帛文獻資料，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可惜的是先生在 90 年代初過世，沒能看到更加引人震撼的郭店楚簡、上博簡和清華簡等。

從 20 世紀 40 年代開始，先秦簡帛陸續大批地在楚地出土。非常有意思的是，迄今我們能夠見到的先秦簡帛，竟然絕大多數都出土於楚國的地域。

20 世紀初，當國學大師王國維為甲骨文、西北漢簡和敦煌遺書的出現而歡欣鼓舞的時候，楚地的文物和文獻卻只是零星呈現在人們眼前，那就是歷史上出現過的一些帶有銘文的青銅器，如楚公逆鑄等。直至 40 年代（1942 年）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的出土，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楚帛文字。那是一幅帶彩繪圖像的帛書，四周有 12 個神像，中間有墨書文字 900 餘字，據考證應為戰國中期楚國數術家所使用的佚書。

50 年代在河南信陽長臺關戰國中期楚墓中出土的一批竹簡，被稱為“最早的戰國楚竹書”，其中有 28 支“遣策”（即記載隨葬品的竹簡）和數十支寫有周公與申徒狄對話的佚文。李學勤先生以為是《墨子》的佚篇，而廖名春認為其中還有屬思孟學派的儒家著作，李零則認為是周公與申徒狄問對中的一種。長臺關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簡雖數量有限，卻開啟了此後半個

世紀大批楚簡出土之先河。

從 50 年代末期迄今，已先後出土了 30 多批先秦竹簡，總字數達 10 萬字以上。它們均屬楚簡，尤以湖北這一原楚國核心區為多，湖南次之，河南又次之。

這些出土楚簡，從其內容來區分，最重要的有以下三類。

(一) 古代書籍

目前竹簡所見先秦古書主要出土三批：

1. 1993 年冬，湖北荊門郭店一號墓出土 804 支竹簡，其中有字簡 730 支，共 13 000 餘字。墓葬時間約為公元前 300 年左右，其中既有道家著作，也有儒家著作。道家著作四篇，為《老子》甲、乙、丙三種摘抄本，字數約為傳世《老子》的五分之二（2 046 字），並有一篇闡釋道家學說的《太一生水》。其餘有儒家著作 11 種 14 篇，分別是《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語叢》四篇。

2. 1994 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先後購入兩批共計 1 700 餘枚竹簡。經研究應為楚簡，可能出自湖北荊州。簡存字數 35 000 餘字。其內容十分豐富，保存有先秦古籍多達 80 餘種。經整理，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八），這八輯共有文章 51 篇。涉及文學、史學、哲學、宗教、文字、軍事、音樂等多方面。數量最多的是儒家著作，但也有如《恒先》、《彭祖》、《凡物流形》之類道家著作。其中有一部分記載內容與楚國有關，如《昭王毀室》、《東大王泊旱》、《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王居》等。而第四輯的兩首佚詩、《采風曲目》，第八輯的《有皇將起》、《李頌》、《鵠鵠》、《蘭賦》，並皆為楚文學藝術作品。

從上博簡第一輯出版後引起熱議的《孔子詩論》起，十幾年來，每一輯的出版均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與熱議。

3. 清華簡。2008 年 7 月，清華校友捐贈入藏清華大學，由該校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進行保護和整理。該批竹簡總數為 2 388 枚（包括殘斷），時代為戰國中晚期（前 305 ± 30）。據整理者披露，清華簡的簡文大多具有楚文字特點，內容則多為前所未見的經、史類古書。尤其重要的是發現了近 20 篇古文《尚書》，其中既有與傳世本篇題相同的，也有傳世本中所沒有的篇目。但即使有傳世篇章的，其文句也多有不同。《尚書》的出現，意義十分重大。據專家目前研究發現，清華簡中至少有 63 篇著作。除《尚書》外，還有詩、史、樂等方面篇章，尤其是清華簡中還有一部類似《竹書紀年》的編年史，時間從西周初年至戰國時代，其中記載了許多過去古籍中未曾記載的史事，對上古史研究意義重大。

清華簡經專家整理，已於 2011 年 6 月出版第一輯，共收錄《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和《楚居》九篇，其中《尹至》、《尹誥》記述夏末商初事；《程寤》、《保訓》、《耆夜》記述商末之事；《金縢》、《皇門》、《祭公》則為周朝史事。《楚居》則是記述

楚人從季連至楚悼王(前 401—前 381)遷徙及國都變化的歷史，已引起這方面專家的極大關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收錄史書類的《繫年》，將能填補先秦史空白部分的內容，已於 2012 年 1 月出版。全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計劃分十五輯出版。

上述三批書簡，雖然上博簡和清華簡因係回購的竹簡而出處不明，但從簡文的文字風格與相關內容中多有與楚國相關的篇章，不難看出其與楚國的密切關係。

除以上最重要的三批先秦書簡出土外，楚地墓葬中出土先秦書簡的還有以下幾批：1957 年河南長臺關楚墓竹簡中《申徒狄》殘簡(前已介紹)；1987 年湖南慈利石板 36 號墓出土的《國語·吳語》、《逸周書·大武》、《寧越子》等；1981 年至 1989 年，湖北江陵九店 56 號墓、621 號墓分別出土《日書》、《季子女訓》等。

同時必須注意的是，在兩漢墓葬中出土的古竹書，也有許多與楚地、楚文化相關的內容。例如 1977 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了 10 多種古書殘片，其中便有《楚辭·離騷》和《涉江》的殘片。有些雖非楚地，也有此類內容，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中便出土了《唐勒賦》殘簡。

帛書方面，除上文所提 20 世紀 40 年代出土的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國術數家使用的楚帛書外，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中出土的大批帛書有 28 種，總字數達 12 萬餘字，主要有《周易》、《春秋事語》、《戰國策》、《老子》、《黃帝書》、《式法》、《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相馬經》、《五十二病方》、《導引圖》等。阜陽雙古堆漢墓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均在原楚地，且這些墓葬時間皆為西漢早期，自然也可看成是楚文化在這些地域的自然延續。其實，身為楚人的漢朝廷統治者，從劉邦開始便“樂楚聲”，楚文化成為漢代的一種風尚，其影響就更加深遠了。以上為戰國及漢代簡帛古書在楚地發現的大致狀況。

(二) 文書方面的資料

這方面包括各種律令、政務文書和獄訟記錄、占卜祭祀竹簡。

有關律令的資料，目前出現最多的竟是秦簡，睡虎地秦律與龍崗秦律都是，岳麓簡也是如此。這說明秦國確實實行法家的一套治國方略，諸事一定於法。楚地卻未見法律文書出土，只有包山楚簡有懷王時期左尹邵施處理獄訟的記錄，可以從中瞭解到楚人斷獄的一些情況。

官府的政務與檔案文字資料應是數量最多的，不過楚簡中發現得不多，只有包山楚簡有部分內容。而里耶秦簡、西北漢簡、三國吳簡中，則動輒以萬計。

占卜類竹簡在楚地已發現多批，最重要的有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天星觀一號墓、包山楚墓、河南新蔡葛陵楚墓等四種，記錄的是墓主生前因各種事情(如疾病、仕途等)而向各類神祇或其祖先占卜並舉行相關祭祀的情況，是瞭解墓主生前狀況的重要資料，從而也讓我們對楚人的占卜、祭祀對象、儀式、種類、祭品等有了比較真切的認識。

(三) 遺 冊

竹簡中出土批次最多的當屬遺冊。遺冊是用以記載墓葬中的殉葬品的，它雖和一般文書不同，但其中也有許多可資研究的內容。

除簡帛文字外，金文也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內容。數十年來，楚地出土了數量可觀的兩周青銅器，這些器物上往往刻有銘文，多者一次發現即有數千字。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巨型編鐘，鐘上刻有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相互對照的樂律，文字達3 000 餘字，而河南淅川下寺王子午墓地出土的編鐘、編鑄也有許多銘文。

目前已知出土的先秦楚地竹簡，估計當在十萬字以上；帛書數方（主要是長沙子彈庫帛書），馬王堆漢墓帛書可視為楚地文化延續，且其中出土的多種反映楚地學術的古書，如《老子》、《黃帝四經》等，這批帛書字數超過了十萬。而金文，據筆者統計目前也已超過萬字。

上述三者合計，我們所看到的先秦楚國文字資料數量在數十萬字。而大量戰國楚國文物的出土，更從方方面面豐富我們的識見，全方位地展示了楚人豐富多彩的生活場景。因此有學者指出，比起以往任何時候，現在都更具備復原古代民衆的生活場景、瞭解他們的思想狀況，從而拉近與祖先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距離，並進行相互對話的各種條件。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我們今天來重新學習和認識楚辭及楚賦作品，毫無疑義，其理解問題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也就非往常之可比。

三

只有獲得相當數量的新出土文獻資料之後，我們才有可能結合傳世的文獻資料，比較有底氣地對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楚國社會的狀況進行描述和復原。事實上，這些年來，學術界已就某一方面的問題作過描述和復原，如江林昌《出土文獻所見楚國的楚官學術與“老莊學派”、“黃老學派”》（《江漢論壇》2006年第9期），鄒時雨《楚國的“反儒”與“兼儒”思潮》（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重點學科研究基地，荆楚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12月16日《文章首發》），馬銀琴《戰國楚簡與〈詩〉在楚國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2008年）等。

按照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對諸子學派所作的區分，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六家在楚的影響。

(一) 陰 陽 家

司馬談在文中將陰陽家列為六家之首，有學者認為這與司馬談的身份地位有關，或有其道理。《左傳》中凡談及天象及《易》象者，多謂之“史”。而司馬遷也往往將“文史星曆”合為一體，這是太史所司之職。但漢初盛行“天人感應”，並將朝代更替以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克理論

加以推衍，因此其重視陰陽五行學說也是理所當然的。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重陰陽家，並非是關注如鄒衍所謂“五德始終論”，而是在於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因為“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而他批評的則是“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也就是陰陽家那些帶神秘色彩的內容。楚之陰陽家，雖不如鄒衍有名，但在天文曆算方面，也是頗有成就的。《晉書·天文志上》載：“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這裏對甘德是齊人楚人，史有爭論，但唐昧卻肯定是楚人，據《史記·楚世家》載，他與屈原同時，生活於戰國中後期，還曾領兵作戰，兵敗被殺。

20世紀40年代出土於湖南長沙子彈庫的帛書，是數術家使用的遺書，其中便涉及天文曆法方面的知識，而屬楚文化系統的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的漆木衣箱蓋上，繪製了二十八宿、北斗、青龍、白虎星象的天文圖等，這表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創立二十八宿體系的國家。1972年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早期漢墓出土的帛書，一向被學術界認定為楚國學術之傳承，帛書的篆、隸兩種《陰陽五行》和《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等，均為陰陽家的著作，可見楚人對陰陽曆法之重視及其成就之卓著。楚國著名愛國詩人屈原在其《離騷》、《天問》等作品中，也以詩歌的形式，寫下許多與天文曆法相關的內容和知識。

(二) 儒 家

儒家雖以孔子為奠基人，但孔子一向被認作是中原周王朝文化之傳承者，他所教授的科目和內容多來自周王朝。司馬談肯定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有的學者在大談楚人的民族特性與北方文化之不同時，卻不關注傳世文獻中已有許多涉及儒學經典在南楚傳播的情況。早在《國語·楚語》中，已記載楚王族用以教育的一套教材的內容，楚莊王(前613—前591在位)讓大夫子亹當太子的老師，子亹向楚之賢大夫申叔時請教如何進行教育，申叔時對他說：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

這裏所提到的《春秋》、《詩》、《禮》、《樂》，雖未必與晚一百年孔子整理後的教材完全相同，但無疑同屬一種文化類型，即中原周文化的類型。教育的內容，最集中地體現了這個民族的文化

傳統和文化認同。儘管楚人西周時僻處荆山，華路藍縷以啟山林，卻始終保持對中原文化的認同。文物工作者在對兩周時期楚地文物進行研究後，均認為從西周至春秋中期，楚文物的形制、特徵均與周王朝及中原各國風格一致。這是非常正常的，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是到春秋中後期，楚國開始强大以後，楚文化才逐漸顯露出自身特色來。

從《左傳》敘述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君臣在不同場合中引《詩》言志的情況看，楚國較之中原的鄭、衛、陳、蔡以及東齊、西秦等國次數都多。而且早在公元前 617 年，楚穆王伐宋，楚左司馬子舟在對話中就引用了《大雅》中《烝民》、《民勞》中的詩句。公元前 597 年發生了著名的晉楚邲之戰，楚令尹孫叔敖在講話時引用《詩·小雅·六月》中的詩句。尤其令人驚訝的是，楚莊王在戰爭獲得勝利後，引了《周頌·時邁》以及《周頌·武》的三段詩文，並從文字學的角度解釋“武”的含義——“止戈為武”，論述了“武”的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他對於周文化相關道德倫理的認識，對《詩》的深刻內涵的闡述，令人印象何等深刻！這豈是那些將楚人視為“蠻夷之邦”的學者們可以解釋得清楚的？因此，儒家根基，楚本有之。

孔子創立儒學後，遊歷四方以傳播其思想，他曾南遊於楚，中途受困於陳蔡，是楚昭王派兵為他解了圍，還打算以書社地七百里封給孔子，只是因為其臣下的勸阻而未實行。孔子的學生中雖以北方人為多，但也有一部分是南方人，如七十二賢人中的言偃（子遊）是吳國人，顓孫師（子張）是陳國人。言偃被孔子認為是最優秀的十位弟子之一，而顓孫師在孔子死後為八儒之一的子張之儒；儒分為八時，子張之儒被認為是群儒之首，子遊之儒也是八儒之一。《史記·儒林列傳》還記載，孔子弟子中，“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澹臺子羽也是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曾有弟子三百餘人，影響甚大。可知孔子之後，其弟子中幾位賢人都在南方傳播儒學（陳、吳後來均屬楚），並且還是儒學中的代表人物。

這些年來，大批儒學著作在楚地出土，如郭店楚簡中，除兩種為道家典籍外，其餘十四種皆為儒家著作，多數為先秦佚書，且產生於孔子之後、孟子之前的二百年間，也就是從春秋末年至戰國中期這段時間。上博簡已出版的八輯中，共整理出文章 51 篇，其中數量最多的也是儒家著作，最為學術界轟動的當屬《孔子詩論》，還有如《子羔》、《魯邦大旱》、《緇衣》、《性情論》、《民之父母》、《從政》、《中弓》、《相邦之道》、《季庚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等。《清華簡》雖只整理出版兩輯，但據整理者介紹，其內容包括《尚書》、《詩》、《禮》、《樂》等重要典籍，僅《古文尚書》內容即有 20 篇左右。雖然整理者沒有直稱為“楚簡”，但卻指出竹簡文字明顯具楚文字風格，而且認為清華簡如出於楚，應當是在“白起拔郢”之前。清華簡計劃出版 15 冊，我們還未能見到全部內容，但其中無疑也有大量儒學著作。

最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先秦儒學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的荀子，他雖曾在齊國的稷下學宮“三為祭酒”，但後來卻三下楚國，並擔任楚蘭陵令。晚年則去職，居蘭陵，從事教育與著述，其《荀子》一書應有相當部分是晚年在楚所作。

從上述概述中，我們對於儒學在楚的傳播情況，應當比較清楚了。

(三) 墨家

墨家本出於儒，但因不喜儒家宣揚的那套繁文褥禮以及厚葬等主張，於是自立門戶，創立墨家學派，批評儒家學說，一度形成很大影響，所謂“天下不歸儒則歸墨”，同為“世之顯學”。有學者提出，子張氏之儒“禹行而舜趨”，與墨家主張接近，在墨家形成中具有影響與地位。墨子曾多次到楚國，宣傳他的“非攻”理論。墨子死後，鉅子孟勝曾至楚國為陽城君（一說魯陽文君）守城，從死之墨家弟子達 180 餘人。可知其與楚關係頗深。1957 年信陽長臺關 1 號楚墓出土《申徒狄》殘簡，有些學者認為此殘簡為《墨子》佚文。《上博簡》（五）載有一篇《鬼神之明》，根據其內容，學者們多認為其與《墨子·明鬼》篇中的觀點近似，或應屬其中的佚文。可知墨子的學說在楚也有流傳和影響。

(四) 法家

法家產生於戰國時代，是一種專制的統治術，其代表人物為申不害、吳起、商鞅、韓非和李斯等。

法家其實與楚國也淵源頗深。當李悝在魏國編寫《法經》時，吳起也在魏進行兵制的改革，後因受讒而於公元前 383 年離魏南下楚國，楚悼王任用吳起為令尹，實行改革，“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史記·吳起列傳》）。雖然這次改革因楚悼王死、吳起被殺而告終，但從記載看，其中一些法令還是延傳下來。只是改革不徹底，因而到懷王時，信用屈原造為憲令，希望達到“國富強而法立”（《九章·惜誦》）。然而，由於懷王信讒，疏遠屈原，使得計劃中途夭折。雖然如此，並不意味着楚政壇上就沒有了法家的身影。許多研究者指出，戰國中後期之黃老學派為兩支，北為齊之稷下學宮學者所倡導，南則為楚。荀子入楚，其學術思想已兼融儒、法、道諸家，故其弟子韓非、李斯均成為戰國後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其中李斯還是楚之上蔡人。荀子還因此為後人所詬病。

(五) 道家

道家與楚國有着特殊的淵源，這是學術界大多認同的看法。據傳，楚人先祖鬻熊曾經棄殷而投周，成為周文王之師。因此後來周在分封諸侯時，封楚於丹陽立國，號為子爵。今傳《鬻子》一書，雖然研究者認為非鬻子本人所作，但書中內容應為後人根據舊聞加以收集整理寫成的，其中應保留有鬻熊的治國理念。此書在《漢書·藝文志》中已載錄。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謂“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這種看法頗近事實。《鬻子》書中，討論了以柔克剛與選賢興國等治國之道，頗與後世道家學說相通，故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其列為道家，“子目肇始，莫先於此”（同上）。《漢書·藝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 37 種，其中之《鬻子》、《蜎子》、《長盧子》、《老萊子》、《鶻冠子》、《曹羽》、《楚子》作者均為楚人，老子、莊

子雖非楚人，但與楚關係密切，他們的故國陳、宋，在他們的晚年也皆為楚所併。

近數十年來的出土文獻也向我們展示了先秦道家著作在楚地的流傳情況。《老子》這部書，曾經被許多學者懷疑是否為先秦著作，然而，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中赫然出現了《老子》甲、乙、丙三組竹簡，雖然其篇幅只及今傳世本的五分之二，但已可充分證明《老子》確為先秦典籍，其產生時間應為戰國中期之前。郭沫若曾認為，今傳世本《老子》，應為春秋時期的道家創始人老子在楚國的傳人所整理寫定，因此書中有一些楚人特有的楚語詞。除郭店楚簡《老子》的出現外，1973年在原故楚的長沙馬王堆西漢早期漢墓中也發現了《老子》帛書甲、乙本，其中甲本不避劉邦諱，顯然應成書於漢代早期或其前。此帛書文字已與今《老子》傳世本大體接近。

莊子是道家另一重要傳人。他的著作在楚地也均流傳。《莊子》書中記載了他與楚國的一些關係，楚國國君曾派人請莊子為相，但被莊子推絕了，不過，他還是去過楚國的，這是他在書中直接提到的。證諸屈宋的作品，我們也看到《莊子》這部書從創作手法到作品內容，均對屈宋辭賦有極大影響，筆者曾有專文作過論述（參看《道家文化與楚賦》，《文學評論》1993年第4期）。從出土文獻中，我們也再一次看到莊子在楚地的傳播情況。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墓葬中出土了《莊子》中的《外物》、《則陽》、《讓王》篇殘簡。1988年初湖北江陵張家山136號漢墓中又出土了《莊子》中的《盜跖》篇，說明《莊子》書也一直在楚地流傳。

黃老道家，過去一直被認為是產生於齊的稷下學派，而出土文獻表明，南楚同樣是黃老學派的發源地，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楚地才是黃老道家的正宗，而齊卻是由楚傳過去的。這些年，黃老學派的著作在楚地多次出土。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在出土《老子》甲、乙帛書本的同時，也出土了被認為是久已失傳的《黃帝四經》，即《經法》、《十六經》、《稱》、《道原》；1993年郭店楚簡出土了《太一生水》，而後上博簡（三）有《恒先》，上博簡（五）有《三德》，這一系列佚文，都是與黃老道家相關的文獻。傳世的《鶻冠子》，過去或以為是偽書，現在已得到確認，為先秦楚國的隱者所著，書中的觀點也屬黃老學派的思想與觀點。《蜎子》作者為環淵，其書雖未傳下來，但司馬遷在《孟子荀卿列傳》中已指出，他與慎到、田駢、接子，“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西漢時，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撰成《淮南子》，其書也應屬黃老學派之作，傳承的是楚人之學。

以上是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提到的五家，至於名家為戰國後期產生的學派，影響並不大。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上所引劉歆的《七略》，則是在六家基礎上將其增為十家，即增加了縱橫家、雜家、農家和小說家。

（六）縱 橫 家

先秦縱橫家以公孫衍（犀首）為首，其後代表人物則為蘇秦、張儀。縱橫之術盛行之時，已是戰國中後期。外交上的縱橫之術，使戰國諸侯國之間不斷洗牌，縱橫家頻繁地在各國間往來穿梭，常為楚王的座上賓。楚國在合縱連橫中自然也是不甘落後的，楚懷王時，關東六國合縱抗秦，懷王還當了總指揮（縱長）。他在位三十年，一直在合縱、連橫的矛盾中左右搖擺，最